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编

郝铁川◎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编

郝铁川◎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研究/郝铁川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06974-9

I. 三... II. 郝... III. ①“三个代表”思想—研究②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D261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5529 号

责任编辑 毕 胜

封面设计 傅惟本

· 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丛书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研究

郝铁川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8 插页 3 字数 333,000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6974-9/D·1202

定价 51.00 元

一路走来

(代序)

一、经历“左”和右的碰撞后走上从政道路

世界上并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早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列宁早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对民粹主义的思考、批判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来又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创立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早年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信奉过康有为,追随过孙中山;邓小平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曾经相信过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同样,我们这一代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引领下,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决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

邓小平是引领我走上从政道路的导师。

——是邓小平把我们这一代人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中解放出来,告别“左”的岁月,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我们这一代,属于眼下社会的中年一代。少年时代,我们遭遇了“文革”,社会灌输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错误的“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因此,那时我们心中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一些支离破碎的语录片断。

当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也极容易让我们接受那些语录。1966年“破四旧”、揪“走资派”;1967年“打派仗”、“文攻武卫”;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9年“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庐山会议”;1971年“九一三”事件;1972年关于林彪反党集团是极“左”还是极右的争论;1973年至1974年的批林批孔;1975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评《水浒》;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连串的事件,使我们用了不少“左”的实践检验了我们所知的“经典语录”和“左”的理论。

当时的我们年轻气盛,激情澎湃,这种年龄段使我们对狂飙突进的“革命”、“造反”很容易倾心。感谢邓小平,是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使我们明白了毛泽东所说的:世界上有香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文革”中灌输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有些是指导革命、夺权而不是指导建设、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有些是歪曲、片面理解和诠释的马克思主义;有些是文字翻译错误带来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把阶级斗争纳入法治轨道,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搞“左”的运动,使我们知道了我们还可以有“文革”之外的活法。回首往事,我们真的是发自肺腑地唱道:“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那样过,生活就得前思后想,想好了你再做。”

——是邓小平把我们这一代人从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中解放出来,避开了右的漩涡,免去了苏东那样的社会动荡。

我们这一代告别“文革”之后,在信仰领域确实出现过迷茫。“文革”十年给我们灌输的那套价值体系被抛弃了,新的价值体系在哪里?当我们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完全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时,当我们意识到“文革”之祸与中国近代缺乏西方近

代那样的启蒙历史有关时，再加上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对我国的策略有别于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很多人不可避免地会把思想的天平倒向“全盘西化”。

感谢邓小平，是他在我们头脑还未完全清醒的时候，发出了“中国不能乱”的警示，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而我们真正理解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是在苏东剧变之后。苏联为什么解体？解体之后为什么内乱不断？我们这一代不管政治信仰如何，绝大多数都是爱国主义者，绝不希望国家分裂、民族衰弱、社会动荡。看到苏东剧变，我们深深地理解了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定立场，深深地感谢邓小平使中国没有发生苏联那种国家分裂、冲突频仍的悲剧。

邓小平对“左”的批判，使我们的生活走上了正常轨道；邓小平对右的防范，使我们的生活避免了脱离正常轨道。我们这一代在经历一“左”一右的碰撞之后，我真正服膺了邓小平理论。由原来决计远离政治转变为积极投身于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

二、做一个学习型官员

时下人们的为官心态，依据我的粗略观察，约有三种：（1）往上做，即谋求官职的不断升迁。正常的官职晋升，表明了一个人的进步和成就，是可喜可贺的。如果你承认做官是一种正当的职业，那么你就会承认做官者谋求职业上的晋升，如同其他行业的人们谋求本行业的技术职务晋升一样，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但做官愈是往上做，资源（位置）愈少，机会愈难求，不可能人人都有机会得到同一个位置。因此，愈往上做，人们愈会感到晋升的机会是“可遇不一定可求，可求不一定可得”。因此，心态要平和，稍安毋躁。（2）往下做，即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好事。往上做机会愈来愈难求，而往下做呢？资源丰富，机会众多，中国有 13 亿

人,每天给一位老百姓办件实事,终身也不可能穷尽天下百姓。(3)往专做,即做专家型官员,任满或退休之后仍可继续为社会服务,毫无失落冷寂之感。21世纪的官员应该成为学习型、专家型官员,跟上知识经济时代的步伐。上述三种做官心态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或者可以兼而有之。就我个人而言,倾向于做一个学习型官员,而且认为不如此,是做不好事的,也是不能称职的。当然,我也讨厌那种拿着文凭、职称作秀的现象。

这几年,我与一些朋友在学术研究中常常发生争论。梳理一下,原因主要如下:(1)中国和西方的现代化历史的最大差异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母体之中,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政权;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却未能产生于计划经济年代,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因此,西方是从限制、分割国家权力的目标出发,设计现代化法治的,而中国则需要保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发展市场经济。(2)中国和西方的政党与国家关系不同。西方近代是先有政权、后有政党;而中国则是先有政党、后有政权。西方政党都没有立国之功,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则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西方的历史产生了多党竞争制度,中国的历史则产生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3)没有抽象的法治,只有具体的法治;没有抽象的人类公理,只有具体的人类历史;没有终极性的法治,只有阶段性的法治。人类社会将经过人治、综治和法治三个阶段。中国现阶段的法治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其特点是综治),而不是中级、高级阶段的法治。(4)极而言之,穷国无法治,因为现代法治需要足够的经济成本才能实现;愚昧无法治,因为现代法治已不再像刘邦“约法三章”时期那样简单;乱世无法治,因为“枪炮作响法无声”,有稳定不一定有法治,但无稳定则断无法治。(5)研究中国的法治,要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的法治概念出发。对西方法学家的学说,理解其核心概念

就可以了，用不着逐字逐句地研读。西方人的法治概念是从西方人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我们同样可以从我们生活中提炼出让西方人觉得深邃的概念，一个概念可以演绎成一个体系，不要被西方法学的体系束缚而动弹不得。消化西方法学概念之后，完全可以用浅显直白的中文表达清楚。那些脱胎于西方法学概念、却令中国人读不懂的中文法学论著，是没有学问和学问不深的低能表演。上述观点既是对我青年时期学术观点的清算与纠正，更是我与一些朋友学术争论的深层起因。

三、把握学者与官员的不同点

我是由学者身份走上领导干部岗位的，因此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学者与官员的不同点，努力使自己名正言顺，举措得当。学者和官员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社会分工，因此应该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文字表达方式和工作行为方式。在商言商、在学言学、在官言官，否则非驴非马、错位乱位，难免贻笑大方、事与愿违。

1. 官员着重讲利害，学者着重讲是非

原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在其所著的《孔子评传》一书中讲述这样一件事，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大搞尊孔活动，意在维护他的领袖地位，而我党则针锋相对揭露蒋介石尊孔活动的实质，批判孔孟之道的糟粕。匡亚明同志在延安见到毛泽东便问道：对孔子是不是也要一分为二，肯定他的思想中的精华？毛泽东说，现在蒋介石别有用心地搞尊孔，我们就不能说孔子怎样好。将来到我们共产党掌握政权了，再对孔子思想进行全面评价总结。

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导师也告诉我一件事：抗战时期，我党为了揭露蒋介石不全力抗日，时常搞摩擦，打压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就大力宣传岳飞抗金的事迹，以影射蒋介石的不抗日。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研究

介石对此心中不快,便向历史学家钱穆询问对策。钱穆说,您可以组织人批评岳飞是个军阀,不听中央政府的指挥。

这两件事都说明政治活动注重的是政治利害关系,而学术研究则相对超越利害,注重客观上的是非。

2. 官员着重求同,学者着重求异

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的是按多数人的意见行事,尤其是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更强调个人要服从领导。另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公务员法律都规定了公务员不得公开批评政府的决定,必须执行上级领导的命令。而学者则与此有所不同,党的学术和艺术活动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者和艺术家着重追求标新立异,多变、差异、选择、独立是这一职业群体的鲜明特点。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方面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只能实行体现个性的相对自由原则。

3. 官员着重讲实际,学者着重讲理想

官员是受人民之托当家理财的人,处理具体事物的“案牍”之劳是无法摆脱的。因此官员不能不着重于务实的思维方式,遇事不能敷衍、搪塞,要有可以操作并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案。官员务实的思维方式与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方式密切相关,量化指标和物化项目是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它们是实实在在的,甚至大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务实难以获得。而学者与此有所不同。学者不参与具体社会事物的管理,掌握较多的人类间接经验和书本知识是他们的职业特长,追求完美和批评现实是他们的职业特性。他们可以开出一系列医治社会问题的药方,但不必直接承担药方实效的责任(所谓“无官一身轻”);他们可以描绘理想方案,但不必一定给出具体的操作方案。

时代的发展,会使更多的学者从政,也会使一定的官员任满之后从学。把握从政与从学的不同点,在什么山上唱好什么歌,是今后值得探索的课题。

目 录

一路走来(代序)	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背景	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精神	14
“七一”讲话:富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29
“七一”讲话中的辩证思维	40
“七一”讲话中的政治思维	52
中国共产党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58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国际共运经验教训的科学 总结	70
依法治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 途径	76
依法治国与党的执政方式	83
依法治国: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制度保障	93
依法行政: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	100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体制、机制与法治 ...	106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当代西方思想理论的借鉴	113
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丰富	

与发展	120
党的十六大的三个重要意义	139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和新举措	153
树立科学辩证的人才观	162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原因	179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基本途径和根本方向	190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主要内容和两大手段	201
党管人才的科学内涵	206
以人才强党保证人才强国	218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背景、主线、结构、特点和 新意	234
执政规律两题	242
领导干部要增强党的意识	247
执政能力和参政能力都要强	254
办大事能力和防错纠错能力都要强	263
从“统治”到“治理”——一种新的社会管理理论评介	275
强政党、小政府与大社会	279
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319
固体废弃物回收与再生利用的法律思考	328
坚持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统一——科学发展观 的理论品格	334
坚持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349
构建和谐本位的法治社会	369
和谐文化三议	376

农村先进性建设要以构造先进生产方式为基础 ...	383
用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390
以先进生产力建设新郊区	398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招商引资工作	403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具有法律约束力 ...	414
苏南和沪郊实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做法和 思考	420
主要引用、参考著作	432
后记	434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历史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天动地的活剧。诞生于 20 世纪初期的以苏联为首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未经百岁,便在 20 世纪末期降下了红旗;“百年老店”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地区丧失了执政地位;中国大陆 1989 年春夏之交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90 年代又有邪教“法轮功”兴风作浪和一连串高级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接连曝光。这些新问题、新情况不能不引起江泽民同志的沉思。

更使江泽民同志萦绕于怀的是,1989 年 6 月 16 日,邓小平同志亲自对他和其他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这无疑是邓小平同志对江泽民同志的最重要的政治交代。因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其核心是两项: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全部邓小平理论集中回答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于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这一重大任务,邓小平同志显然是交给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概而言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遇到了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遇到了人类社会“第三代、第四代现象”的挑战

所谓“第三代、第四代现象”,是指封建社会一个朝代的统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研究

近代一个政党的执政、一个企业的发展和—个家族的延续，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往往发生重要的转折。

1. 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些统治时间较为长久的朝代，平均寿命是200年左右，前五六十年是稳定发展时期，而后一百四五十年则是停滞、腐败、走向灭亡时期。前五六十年是第一代、第二代统治时期（每一代人的时间为25年或30年），后一百四五十年是从第三代、第四代开始的

在中国历史上，西汉是210多年（不包括新莽时期），东汉是195年，唐朝是280多年，明朝是270多年，清朝不到300年。那些不足200年的朝代大都不是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是通过宫廷政变和诸侯、军阀混战建立的，因而是短命的。

为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等，大都发生于一个朝代的前五六十年之内。“文景之治”发生于西汉前55年之内，“贞观之治”发生于唐朝的前30年之内，“光武中兴”亦发生于东汉的前30年之内。

为什么这些朝代的前五六十年是稳定、发展时期？因为这往往是第一代、第二代统治时期。第一代是开国者，知道农民起义的厉害，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此大都能够对农民阶级采取一些让步政策。继任者第二代或者是参与过第一代的开国活动，或者是亲眼目睹了第一代创业的艰难历程，因而也大体上能够保持第一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和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的创业意识。

可是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情况就有所变化。其一，第三代、第四代生长在和平年代，对五六十年前艰难创业、辛勤建国的历史已不甚了了，忧患意识和创业意识容易淡薄。其二，第三代、第四代生长于皇宫，而不像第一代、第二代那样有民间生活经历，因而对社会现实了解不深，对国计民生缺乏真知灼见，或纸上谈兵，或任凭宰相、宦官和外戚左右国政。

中国封建社会中,这些统治时间较为长久的朝代就是这样,200年一个周期,200年内前五十年稳定发展,后一百四五十年腐败灭亡,周而复始地运行了两千多年。

2. 近代以来,不少党执政的时间往往也是五六十年,不过两代人的光景。两代之后,往往会发生重要的转折

苏联经历列宁、斯大林两代之后就衰落了,共产党执政总计74年。日本自民党自1955年开始执政,1993年7月在大选中败北,只好将政权拱手交给由社会党、公明党、新生党、民社党、社民党等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前后执政38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开始执政,在1988年和1994年的大选中,得票率从以往的80%~90%降至微弱多数,失去了历来在议会中占三分之二多数的压倒优势;在1997年的中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败给了其主要劲敌民主革命党;与此同时,两个主要反对党,即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在众议院的议席之和也首次超过了革命制度党,墨西哥形成了三党鼎立的政治格局;在2000年7月的大选中,该党惨遭失败,党的候选人得票率仅为33.18%,从而沦为在野党,前后执政71年,但从执政第60个年头就开始衰落了。印度国大党曾领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取得了成功,并长期领导印度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曾深得印度人民的信赖。但在执政45年后,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另一个“百年老店”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经历蒋介石、蒋经国两代之后就衰败了,李登辉之后沦为在野党。

3. 西方的企业平均寿命是40多年,也是将近两代人的时间

企业寿命这个概念,对于我国长期从事国有企业工作的人们来说,在过去的理念中是根本没有的。今天进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这就涉及企业寿命问题。美国的硅谷每天产生上百个百万富翁,但同时美国的企业每年要倒闭几万家。199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上升到9年来的最高水平3.9%。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倒闭了83300多家企业。美国的高新科技产业只有10%活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研究

5年。1997年日本企业仅上半年就倒闭了13 000多家。1996年上半年德国平均每个月倒闭2 000家,台湾平均每个月倒闭2 200家。

一个企业能活多久,壳牌(SHELL)石油公司对世界前500名企业跟踪调查13年,从1970年到1983年,世界500强名单上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消失了。1997年的世界500强中,美国有175家,日本有112家,中国只有6家(大陆3家,台湾2家,香港1家)。大陆是中国银行、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研究得出结论:一般大企业平均寿命40余年。日本80%的企业经历这样的过程:10年打基础,10年发展,10年成熟,然后进入瓶颈期,即所谓困难期。

4. 一个家族的发展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也往往容易发生重要的转折现象

根据对各国、各地区企业史的考察,家族化的企业往往是少则二代,多则三代,就会由盛而衰。《红楼梦》中的贾氏家族到了第三代贾宝玉,便开始衰落。按照曹雪芹的写作思路,一度繁华的大观园最终将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当然,小说是虚构,但毕竟源于生活。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贾氏家族这样的原型,曹雪芹根本就不可能进行创作。

“第三代、第四代现象”绝不是笔者的什么重大发现,中国的老百姓早已经用他们的肉眼观察、世代经验的积累和丰富的生活智慧,揭示了这一现象。中国民间很早就有这样的谚语:“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五十年风水轮流转”,“六十年运气轮流转”。

“第三代、第四代现象”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第三代、第四代能不能继续坚持第一代创业者艰苦奋斗的传统和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懈怠的忧患意识。二是,第三代、第四代能不能在第一代、第二代积累(开荒)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发展

思路、再创辉煌(精耕细作)。这两个问题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第三代、第四代能不能处理好“继往”和“开来”问题。有的人“继往”有余,“开来”不足;有的人则是“开来”有余,“继往”不足。

中国现在是第三代、第四代交替的重要时期。近年,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前辈几乎将全部退休,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培养、提拔起来的领导干部将大部分退休,而改革开放期间培养提拔起来的年轻同志已经或即将走上领导岗位。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以事实击碎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中国第三代、第四代将发生和平演变的预言,能不能避免、跳过以往人类社会的“第三代、第四代现象”,能不能跳出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周期率,现在是一个关键时期。

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遇到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人类社会发生过多次科技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给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带来振兴的机遇,同时也会淘汰一些不识时务、抓不住机遇的民族和国家。人类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五大古国,目前只剩下中国一个。其他四个都已断线,成了历史。人类社会的文明是多样的,究竟有多少呢?中国的学者缺乏研究,英国的汤因比在三卷本《历史研究》中,认为从古到今出现的文明有26种,迄今“活”着的只剩下八个,其他均已死亡。美国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从古到今出现的文明有12种,迄今还“活”着的只剩下五个,其他均已死亡。

近代以来,人类已经历了三次技术革命,即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蒸汽机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力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和20世纪40至50年代以原子能、电子技术和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电子计算机、激光技术和生物工